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贫困特征及 “扶志”与“扶智”的耦合机制建设 ——基于四川甘孜、凉山两州的调研思考

张跃平 徐凯¹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处于深度贫困状态的甘孜州与凉山州由于地理条件恶劣,导致脱贫的“信心”与“智力”不足,也严重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因此,要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建立“扶志”与“扶智”耦合的精准扶贫机制,深入推进“扶志”、“扶智”和“扶志”与“扶智”耦合的三大工程。

【关键词】:深度贫困区 精准扶贫 “扶志” “扶智” 耦合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9)05-0149-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打赢扶贫攻坚战,不仅需要加大资金、物资等投入,而且更要注重有针对性地扶志与扶智,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只有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相结合,通过自身“造血”巩固“输血”的成果,才能彻底拔除穷根、消除贫困。他强调,“脱贫攻坚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提出了“破解深度贫困”思想。2017年11月,中办、国办联合下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实施特殊扶贫政策。

“信心”与“智力”不足严重制约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基于此,笔者深入四川甘孜州、凉山州(以下简称“两州”),了解脱贫致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两州”具体贫困特征,分析当前深度贫困地区“扶志”与“扶智”的基本状况,厘清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的思路,重点探索深度贫困地区持续长效扶贫机制。

一、对“扶志”与“扶智”的理论审视

1. 重视精神扶贫,激发贫困者内生动力。多位学者从不同学科论述了贫困中的“缺志”问题。阿帕杜莱将志向缺失定义为“贫困者可能缺乏争取和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志向”。愿望的缺乏导致信念、欲望的降低,进而直接影响贫困者的经济决策和努力水平。努力程度的降低导致行为结果偏离理想目标,进一步导致志向水平的降低或维持在低水平。道尔顿等人解释了贫困状态产生的悲观心理和消极信念,认为它可能导致个体陷于贫困陷阱之中^[1]。迈克尔森认为,贫困人口由于处在信息稀缺的状态下,自身认知“带宽”不足,要么忽视了决策所需要的关键信息,要么无法应对过多的信息,导致在经济决策中失误甚至无法做出选择,加剧了贫困的深化^[2]。

世界银行在扶贫实践中发现,利用积极心理学方法对贫困者积极特质、情感和情绪的唤起和促进,对于提升贫困者的志向

作者简介:张跃平,男,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与民族经济。

水平有显著的作用。王德文、蔡昉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和社会排斥，避免他们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是未来中国消除贫困的重要政策措施^[3]。美国经济学家南多瑞在研究明尼苏达州路易斯县贫困人口时发现，即使有当地的政府与社会的努力，如果个人不积极的响应，那么基于地域性的个人原因贫困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南非的戴维和古驰也提出，当地贫困居民甚至愿意相信宿命论来宽慰自己的贫困，个人主观层面上自弃而导致的贫困是外部因素很难提供解决办法的，需要从改变贫困者自身的心理状态入手^[4]。

2. 开发贫困者智力，提高素质技能是脱贫的基础。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发生根源在于，贫困人口“一个人所拥有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的缺失，这是更严重的贫困问题，即能力贫困。舒尔茨进而认为，人力资本的短缺和对人力投资的忽视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也应当是提高人口质量与知识水平。洛克藤堡指出，美国扶贫成功的关键在于发动地方政府，尤其是社区的力量提供服务和培训，推动教育的普及，帮助城市贫民从根本上增强抵御贫困的能力。池上惇、二宫厚美也强调，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们的生存意义和生活品质。

冈纳·缪尔达尔通过关注贫困人口综合因素，分析贫困原因，力图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李实认为，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税收调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收入流动性、腐败收入六个方面^[5]。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影响贫困人口的发展，甚至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邵志忠认为，群体无意识作为该区域人力资源的群体性特征，制约了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从而延续了贫困^[6]。林闻凯指出，师范教育能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信息扶贫等，特别在提高贫困地区师资力量方面形成脱贫的内生动力^[7]。汪三贵提出，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措施，适当考虑把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针对贫困户就业和生产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培训需更加精准^[8]。

3. “扶志”与“扶智”应耦合互动。米克尔森认为，长久的贫困状态带来的社会排斥、刻板印象、自我污名、耻辱感和不被尊重感，会降低贫困人口的自我效能和心理健康，同样也会降低志向水平^[9]。斯宾塞发现，当贫困者意识到自己的贫困弱势身份时，会降低对于自身的期许和行为的期望，继而降低努力程度，使得原本能做好的事情打折扣。因此，为了提升扶贫的效率，应消除社会排斥、改变贫困者的耻辱感，来激发他们的自我脱贫意识。杭承政、胡鞍钢提出，利用精准化的社会治理和超常规的靶向性公共政策工具，治理由于个体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非理性引发的“精神贫困”，利用公共政策的长效性建立“扶志”的可持续发展机制^[10]。

对于扶智的可持续路径，多位学者建议，利用外部优势资源激发贫困户内部人力资本的跃迁。邓德艾、毕宪顺等提出，从精准识别、精准运行和精准监管方面，利用职业教育在职业培养、就业培训和创业指导上的功能优势，培养职业化人才，实现满足市场需求、完成政策要求、回应实践诉求的目标，以提升精准扶贫效能。曾力提出，应跨越数字鸿沟，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实施“互联网+文化”战略，发展文化产业精准扶贫，推进社会力量助力文化精准扶贫。詹景海认为，图书馆扶贫是文化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精准扶贫的扶人、扶智、扶文目标^[11]。齐冬红认为，精准教育扶贫是提升个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内在需要，也是遏制贫困代际传递的必然选择^[12]。李俊杰等建议，高校应集中智力、人才、科研等方面优势，在实施精准扶贫中可以实施人才扶贫、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和文化扶贫^[13]。

二、甘孜、凉山两州贫困特征

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两州”基础设施薄弱、自然资本缺乏、思想观念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加之国家对区域开发的限制，导致深度贫困。

1. 自然环境恶劣，区位封闭，带来物质贫困。恶劣的自然环境是导致农牧民贫困的主要原因，脆弱的生态环境直接制约了产业开发与经济发展；加之自然灾害频发，产业基础十分薄弱，可利用资源少，经济发展难度大，贫困户只能靠天吃饭，收入低且来源单一。恶劣的人居生存环境对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高原性疾病、慢性病等发病率高，给贫困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

负担，阻碍了贫困户脱贫，因病致贫成为主要致贫因素。资源无序开发造成水源枯竭、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贫瘠。

两州皆为偏远地区，是我国的边疆地区、生态脆弱区、主体功能区。甘孜州平均海拔4112米以上，583个贫困村(占贫困村总数42.87%)集中在高寒地区，648个贫困村(占贫困村总数47.65%)分布在高山峡谷地带，只有129个贫困村(占贫困村总数9.48%)散落在光热等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贫困地区生产生活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高山区而言，其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较为封闭的环境成为滋生“贫困文化”的土壤。甘孜州是四川省至今没通铁路的3个市(州)之一，有19个乡未通柏油路、344个行政村未通硬化路、133个行政村无通信网络、87个行政村不能收看电视，部分村群众安全饮水、生活用电亟需提升改造。

2. 市场化水平低，导致收入贫困。由于其自然环境恶劣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两州与外界交流的渠道有限，较少受到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而且两州历史上一直是以农耕、畜牧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虽经长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凉山州农业占比从2007年的28.9%降至2017年的20.0%，但仍为四川省(11.6%)的近2倍。闭塞的自然环境以及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广大农牧民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农牧业生产率和农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低，大大制约人均水平提高。凉山州2017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15元，低于四川省同期12227元。

两州处于较为传统的农耕游牧状态，现代化、科学化、绿色化的农牧业尚未形成有效规模，产业结构单一，缺少农业龙头企业。农牧业产业化起步晚、水平低、规模小，种养殖业难以形成规模化，产品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农牧产品市场化水平低，制约了农牧民收入的提高。产业扶贫主要采用外部市场主体带动产业开发的模式，致富带头人或致富能人的缺乏使得依托本地资源致富的机制难以形成。当大量的扶贫政策和资源供给时，贫困户常因财富观念、自身能力等原因而无法直接享受到扶贫政策，导致扶贫效益溢出。农牧民缺少科学的种养殖技术，产品质量不高，加之农畜产品价格波动大，受市场的影响极大；农产品质量无统一标准，市场竞争力不强，影响到稳定增收。甘孜州部分地区仍沿袭“广种薄收、靠天养畜”的粗放生产方式，群众生产技能普遍低下，“等靠要”思想严重，全州有9.7万(占贫困人口近50%)困难群众需通过扶持生产、帮助就业实现脱贫。

3. 生活方式落后影响财富积累，导致能力贫困。传统宗教活动在凉山州农村彝族中比较流行。一般情况下，海拔越高、越封闭的地区，宗教活动越盛行。每次宗教活动需要较大开销。在彝族文化中，祭品越贵重越能表现信徒的虔诚，即使是贫困家庭，也要保证宗教活动的支出。宗教性支出不属于生产性投入，很难产生经济效益。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巨大宗教的投入妨碍了家庭资金的积累，不利于贫困户脱贫。此外，在宗教活动和婚丧嫁娶中需要宰杀牛、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导致贫困户缺乏脱贫的资本积累。一些Z族群众受佛教影响，出于修来世的美好愿望，有不杀生的习俗，养殖的大量牦牛不以商品出售，出现守着大群牲畜而生活水平却很低的贫困牧民。

4. 思想观念封闭，导致精神贫困。以往扶贫理念重物质扶持，忽视对接贫困群体的文化需求，常常导致简单的“给予—索取”的悖论。实现可持续性脱贫，须改变这些群体的扶贫观、发展观，使其逐渐与现代化的财富观接轨。深度贫困地区交通封闭，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相脱节。两州文盲半文盲率高，有的群众不会讲国家通用语言，“圈内”交往的文化不断强化，塑造着贫困户的基本特点和特征，并代际相传。文化的落后使贫困户对自身和扶贫政策缺乏认知能力，缺乏脱贫的内生动力，自我脱贫意识不强。两州有的地方自然条件并非十分恶劣，但由于长期接受各种援助，产生“等靠要”思想。此外，两州贫困户理财意识弱。近年来，不少农牧民以采挖虫草获得了较高收益，但缺乏理财知识，认为有来年的虫草收益作后盾，往往一年的收益当年全部花光，然后靠民间借贷维持生计。

表1 凉山州、甘孜州“扶志”与“扶智”及激发内生动力情况

	凉山州		甘孜州	
渠道	着重点	实施效果与意义	着重点	实施效果与意义

农民夜校	激发内生动力	参与率低于 35%	提升志气, 转变理念	参与率不足 20%
农民技能培训	提升生产技能	参与率高于 50%	扩展经营层面	参与率 20%
农村专题讲堂	改善生产生活	参与率小于 30%	转变经营, 参与市场	参与率低于 30%
劳动力培训	转移富余劳动力	转移效果欠佳	加强市场经济参与度	缺乏转移意愿
基础教育	思想意识转变	新一代影响老一代	汉藏教育结合	新一代影响老一代

如上表所示, 目前两州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改善与改变农牧民现有的思想意识与信心观念, 旨在进一步通过“扶志”与“扶智”的方式来促进地区脱贫致富; 在渠道上采取了农民夜校、技能培训、专题讲堂, 三重措施叠加, 都是讲授知识与意识的转变性教育进村入户, 送到家门口。由村干部、挂职干部与驻村干部一同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培训, 方式方法多样, 但参与却不积极, 来参与的也仅仅抱着看热闹、打发闲暇时间的心态, 培训一旦超过半小时, 就有大量的村民离去, 更多地是看是否有免费粮种发放, 存在着占些实惠的心态, 一旦缺乏有效的吸引, 参与就难以得到保障。这种占些实惠的心态, 说明其意欲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 这种思想正是参与市场经营的基础, 但他们缺乏的是如何改变自身, 去获得更多实惠的意愿与勇气, 害怕走出去, 偏居一方、得过且过的思想尤为明显。出现这样的状况, 一是缺乏知识与智慧, 没有参与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 二是缺乏真正愿意去改变的意志, 看着同村的老乡, 基本生活水平相差不多而安于现状。改变这一切的抓手是让他们孩子接受教育, 在此过程中, 树立远大的志向, 要有走出凉山、走出藏区的志向, 树立全新的思想与意识之后, 通过扶智教育, 让他们有改变自身的武器——知识。如果进取的思想带回家中, 每一个彝族、藏族家庭内就会产生激烈思想碰撞与冲击, 再结合各个阶段进行有效的“扶志”与扶智的手段和措施, 内外结合, 让彝族、藏族同胞的观念改变。思想的碰撞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是能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 而非完全的等靠要。

5. 教育医疗资源短缺, 导致人力资本匮乏。除了思想和文化“贫困”, 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导致两州脱贫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两州严酷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基础设施, 导致教育、卫生与公共服务资源的严重短缺。虽然学校条件正在逐步改善, 免费教育的年限在延长, 医院保障水平在提高, 但合格教师、医生的缺乏仍是两州面临的共同难题和突出短板。2017年甘孜州基础教育各项指标均低于全国水平: 小学净入学率99.54%(全国99.91%); 初中净入学率98.4%(全国103.5%); 高中毛入学率85.26%(全国88.3%)。贫困农牧民家庭部分收入来自小孩放牛、放羊、挖虫草、捡贝母, 孩子上学不仅少了这笔收入, 还要承担其教育成本, 增加了家庭负担, 因此影响了父母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另外, 由于居住分散, 上学路程远, 不少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缺乏教育设施设备, 教师队伍水平不高, 客观上物质约束使得不少普通群众更看重寺院教育。教育基础的落后和软硬件环境交叉制约, 使得藏区学生普遍入学难、辍学易、留不住, 导致了人力资源素质偏低、人力资本不足。尤其缺乏熟悉环境、掌握藏语、彝语, 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体系及综合素质较高的教师。正因产业发展不足和经济缺乏市场因素, 使得当地劳动力整体技能素质偏低, 一些有技能的劳动者不愿意留在当地, 流失严重, 而低素质劳动者又无法走出去, 导致当地产业发展一方面缺乏高素质劳动力; 另一方面大量低技能劳动者溢出, 形成区域劳动力二元结构。

三、完善破解深度贫困的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如果扶贫不扶志, 扶贫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即使一度脱贫, 也可能会再度返贫。扶贫必扶智, 绝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坚决阻止贫困代际传递。

构建深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必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二是建立“扶志”与“扶智”耦合的机制。

1. 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以内部动力机制为主体的市场化扶贫机制。以股份式的经济合作方式为载体, 结合贫困地区当地特色资源, 在政府指导、企业援助、农户参与情况下, 形成三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性的市场化扶贫机制。市场化扶贫的核心是打破现有的内部经济圈, 调整产业结构, 创造符合市场需求的经济成长环境, 实现该地区经济

高效发展。市场化扶贫成功的关键在政府，要转变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主要行使立法、组织、评价职能等。

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契约合同的方式，在合作方之间达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做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用制度化的手段实现合作主体间的双赢。政府在扶贫过程中要坚持政府扶持的公益性与企业经营的效益性相结合，实现利益共享。政府不能要求企业违背经营发展的基本轨道，承担政府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应当在促进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在拓宽企业产业规模的基础上，带领、组织更多的贫困农户参与企业产品的采购、加工、包装、销售过程，政府作为担保方，一方面保证企业的基本利益；另一方面要保证贫困农户能够通过参与特色产业，提升自身收入，政府与扶贫组织在其中应当起到催化剂与粘合剂的作用，不介入企业日常经营，不影响贫困农户的基本收益，不搞“政绩工程”，实现政府倡导下，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和谐纽带，成立长效的合作机制与合作组织，企业通过与协助政府管理的合作组织建立生产加工的劳务合作机制，形成企业引领、政府协助、贫困户参与的多方共赢发展、带动扶贫脱贫的局面。

2. 建立“扶志”与“扶智”的耦合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除了自身自然环境恶劣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外，与部分贫困人口慵懈怠息、不思进取、自我驱动和发展能力不足有一定的关系。“志”和“智”不足成为制约脱贫致富的瓶颈。部分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甚至把扶贫政策当成了养懒人的政策，争着当贫困户、低保户。贫困群众普遍文化素质偏低，有的读书看报、填表算账都困难，脱贫能力普遍欠缺。“十三五”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既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物资解决迫切的生产生活之需，更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思想觉悟、精神状态和文化素养，“扶志”、“扶智”双轮齐驱，催生精准扶贫的思想动力和行为活力。

扶贫先“扶志”，“扶志”即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要淡化贫困意识，形成脱贫愿望，增强脱贫信心，斗志，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改变贫困落后境况，坚定不移地从事生产和家乡建设，促进边远贫困地区的全面发展。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是精准扶贫的两个方面，真正的脱贫是精神脱贫，否则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要向贫困群众宣传党和国家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描绘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景与宏伟蓝图，使贫困群众产生情感认同与价值共振，形成对脱贫致富的美好向往，以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作为精神支柱，激发脱贫致富的勇气和勤劳实干的精神。

“扶志”才能增强精准脱贫信心。要使贫困户相信，在党和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部署下，贫困地区依托特定政策支持、资源优势 and 自身努力可以弥补条件差带来的劣势。要引导贫困群众坚信脱贫攻坚战必胜，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克服自卑心理，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困难、摆脱困境的信心，形成艰苦奋斗、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

“扶志”才能激发精准扶贫的高昂热情。要摒弃不思进取的保守落后思想，鼓励贫困人口奋发图强，发挥对生产生活的主体能动性，勇于开拓进取。要不畏困难、意志坚定、思想解放，以高昂的斗志投身到脱贫行动中去。

“扶贫”必“扶智”。扶智即加强思想文化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帮助贫困人口提高文化程度、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使之懂技术、讲方法，为精准扶贫提供知识基础、专业技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扶智”才能夯实精准扶贫知识基础。教育是反贫困的根本手段。要继续大力发展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加大教育扶贫资助力度，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能力，为贫困地区下一代健康成长创造公平的教育机会，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程度，为精准扶贫夯实知识基础，为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智力保障。“扶智”提高精准扶贫专业技能。要注重培育贫困户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加工、农业产业延伸服务等的基本素质和专业技能，鼓励劳动转移就业，提高工作技巧和效率，让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让其在专业岗位发挥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提高其谋生技能和专业技术技能，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用自己的智慧断穷根、摘穷帽。

参考文献:

- [1] Dalton P S, Ghosal S, Mani A. Povert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5(590).

-
- [2] Mickelson K D, Willams S L. Perceived Stigma of Poverty and epression: Examination of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mediators [J] .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Guilford ublications Inc. , 2008(9) .
- [3] 王德文, 蔡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消除贫困 [J] .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7.
- [4] Yul Derek Davids, Amanda Gouws. Monitoring 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Poverty in South Africa [J]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0 (3) .
- [5] 李实, 赵人伟.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 [J] . 经济研究, 1999(4).
- [6] 邵志忠. 从人力资源因素看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 [J] . 广西民族研究, 2011(2).
- [7] 林闻凯. 论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 [J] . 高教探索, 2014(5).
- [8] 汪三贵, 殷浩栋, 王瑜. 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挑战与政策展望 [J]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 [9] Spencer B, Castano E. Social Class is Dead : Long Live Social Class Stereotype Threat among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ividuals [J] .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Springer US, 2007(4) .
- [10] 杭承政, 胡鞍钢. “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4).
- [11] 詹景海. 精准扶贫视角下图书馆文化扶贫路径研究 [J] . 图书馆学刊, 2017(1).
- [12] 齐冬红. 探析精准教育扶贫 [J] . 未来与发展, 2018(1).
- [13] 李俊杰, 耿新. 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三区三州”为例 [J] . 民族研究, 2018(1).